

文庙学宫历史文化初探

□ 庞 洪

孔子刚去世,鲁国当时的国君鲁哀公非常悲伤,亲自写了诔文祭悼孔子,并在文中尊称孔子为“尼父”。鲁哀公又在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,把孔子阙里的故宅改为庙,以奉祀孔子,这就是中华大地上专门供奉和祭祀孔子的第一座孔庙。

汉高祖刘邦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,他似乎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中,已经意识到通过道德教化来安定天下的重要性,虽然古人有诗句说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,但这位曾经给读书人头冠内撒尿的马上皇帝,在经过鲁(曲阜)时,也知道用“太牢”的最高礼仪亲自到孔庙祭祀,以垂范天下。上行下效,当时到齐、鲁赴任的地方官,也都要先行祭祀孔子,然后才安民理事。汉高祖祭孔,为后世皇帝带了好头,而当时地方官的祭孔,则已显现出后世各级行政地方普建孔庙的端倪。但两汉时期,还没有普建孔庙之事。

各地建立孔庙,是在南北朝的北齐时期。根据唐代史学家杜佑的《通典·释奠》记载,可知:周代的制度,凡立学校,必先有祭奠先圣、先师。但是,当时的先圣、先师,并不是专指孔子。比如:周公在学宫内享祭,就在孔子之先;各诸侯国的学宫内,也都奉有他们自己的圣贤。

到了三国曹魏时期,齐王曹芳学完所有的经书之后,就命“太常”以太牢到辟雍(太学)祭奠孔子,并以颜渊配享。孔、颜是以怎样的形式享祭,不大清楚,但肯定还不是庙。而在未有孔庙之前,颜渊却已经配享孔子了。

魏以后,祭孔有春秋二仲(二、八月)祭,有一年四仲(二、五、八、十一月)祭,到了北齐时期,仲祭之外,每月的朔日(初一)还要行清晨的朝祭。这对于各级的学宫来说,实在有点繁琐,所以各地的“郡学”为了礼拜的方便,“则于坊内立孔、颜庙”。

在这里“坊”的字义是“别屋”,即在学宫内另辟一个处所,作为供奉孔、颜的庙堂。从“孔颜庙”三个字师生不分的不伦不类上,也可以想象到庙堂初立时的简陋。不过,尽管简陋,自曲阜孔庙以后,各地的学宫内,终于有了专门供奉孔子的庙堂。值得一提的是,到大唐武德二年,皇帝才诏令国子监内立孔庙。看来,在曲阜以外,各地为孔子立庙于地方的学宫内,实际上是走在了皇帝的前面。

鲁哀公当初于国君的身份为孔子立庙,在对孔子人格、学识无比景仰的同时,还怀有在政治上没能重用孔子的深深懊悔和惋惜,所以,这当初的第一座孔庙,在纪念意义上,就已经超越于家庙之上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,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虽然在政治思想上确立了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,但在社会意义的文化形态上,却没有相应地确立起孔庙这样的教化形式。

以先圣、先师的资格享祭于学宫,孔子最有代表性,当仁不让。然而,起码在唐之前,对孔子的祭奠乃至立庙,只局限于学宫之内,未免只侧重于“师”的一面,而孔子“圣”的一面,对社会的影响,实在是全方位的。所以,把孔庙依附于学宫,换位成学宫依附于孔庙,也就是升华孔庙,使之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意义上,引领整个社会。要确立这样一种文化形态,似乎是在期待着一个鼎盛的王朝,才能得以完成。唐高祖武德二年,诏令国子学立周公、孔子庙各一所;唐太宗贞观四年,诏令各州县普建孔庙;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又谥(追封)孔子为文宣王,充满盛唐气象的文宣王庙,从此遍布中华。

明、清时期,孔庙又被称作文庙。准确一点讲,应该是明嘉靖元年,嘉靖皇帝诏令去孔子“王”号以后。也许,在约定俗成的口语上,文宣王

庙被称作文庙,应该早于皇帝的诏令,但从文化概念上,并不可以简单地把文庙看成是文宣王庙的省称。因为与文宣王庙相对应的是武成王庙,供奉的是姜太公;与文庙相对的应是武庙,供奉的是关羽;它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。两相比较,省去了“宣王”两个字,少了封建意识的累赘和束缚,“文”的内涵,反而更加丰富。如果用一个字来定义孔子一生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,“文”字就最精确不过。把历史文献中的相关庙名作一个比较:如孔颜庙、文宣王庙、宣圣庙、先师庙、以及夫子庙,还数文庙来得自然、妥帖。可以说,平民大众的约定俗成,正是历史文化的深思熟虑。

孔庙的情况要特殊一些,笼统一点讲,凡是供奉孔子的庙堂,都可称作孔庙或者文庙。但曲阜孔庙称作文庙,就非常别扭,起码在与之相对应的地方,就永远没有武庙存在的可能;而平遥城内的文庙,要称作孔庙,古城整体格局“左文右武”的经典意义,也就无从讲究。

曲阜孔庙,得天独厚,惟此为尊,是一个特例。正因为特殊,所以在文庙的普遍意义上,就不不具有代表性。比如平遥文庙大成殿以后的明伦堂、敬一亭、尊经阁,以及两侧的东学和西学等建筑,就是曲阜孔庙所没有的,而这些建筑,却是天下文庙文化非常重要的内容。

平遥古城是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,要谈文庙文化,平遥文庙应该就是一座极有代表性的精典范例。

平遥文庙坐落在古城的东南隅,坐北向南,北靠城隍庙街,南临云路街。往南,一直到南城墙,还有牌坊、照壁、泮池井、文昌庙,上城墙又有云路坊和城墙东南角上的魁星楼,以及古城东南四十里之外的超山顶上,与文庙、魁星楼遥相呼应的文峰塔,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庞大、意象丰富的文系建筑群。无论是文化讲究,还是景观品位,可以说,平遥古城的一城文秀,尽在东南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东南方位有什么特殊的讲究?平遥文庙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,为什么要建在东南方位?这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?

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,东南方是一个生机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方位。《淮南子》一书认为:

“日冬至,日出东南维。”当白昼最短、阴气最盛的冬至这一天,太阳升起的方位,正是东南。所谓“冬至一阳生”,阴气开始消退,阳气开始增长的转机,就在这个范围。在这阴阳互动、阴消阳长之中,孕育着无限的生机。宋代的哲学家张载,把这种机理称作“太和”。《周易》一书认为:“东南方位属‘巽’。巽者,顺也。”兆征万物,顺应自然而畅达。中国神秘文化的风水学说也认为:东南巽方属“贪狼木”,主“得生气”。虽然这些观念,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,如在建筑形态方面:平遥古城迎对东南方位的上东门的匾额,就题着“太和”两个字;而平遥人坐北向南的宅院大门,就都建在“得生气”的东南方位。但是还不足以定格文庙及其它文系景观的建筑方位。

倒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些星宿,却和文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景观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武则天称赞她的宰相狄仁杰是“斗南一人”。所谓“斗南”,就是指北斗之南东南方位的这片星区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:东方属春,南方属夏,东南方位属春夏之际。当“斗柄东指,天下皆春”之时,主文章、科举的魁星,主功名、禄位的文昌六星,主坐论朝政的三台六星;还有二十八宿之中属斗宿、主文运的南斗六星,属辰宿、为龙左角的天田二星,属牛宿的天田九星。这两组天田星,就是后来才和文庙相干的棣星,都在这片星区。真可谓是文星荟萃,辉耀东南。

原来,是因为和天上的文星遥相呼应,才把天下文庙以及文昌阁、魁星楼、文峰塔建在了东南的方位,这应该是不错的。但是,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,古代多彩多姿、引人入胜的天文、天象,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翻版。这一点,在东西方文化中是一样的。天下文星荟萃东南,绝不会像鸡下蛋、蛋孵鸡的颠倒逻辑,又反过来是为了呼应天下文庙。从史书中《天官书》、《天文志》的记载,可以知道,像三台、文昌等文星概念的形成,实在天下普建文庙之前。那么,文星荟萃东南,又源于古代怎样的社会现实呢?

追根溯源,文星的概念形成于不同的时代。最早的文星——三台和文昌,就分明带有汉代的特征。汉代把尚书、御史、谒者统称为三台。三台都是专制朝政的高职文官。文昌,是文治教化的

意思,但又何尝没有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色彩,而文星荟萃于东南方位,大抵与朝仪有关。《史记》中,蔺相如为赵国立了大功,“拜为上卿,位在廉颇之右”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证。可以想象得出:只有廉颇和蔺相如这俩相二人,比肩立于朝堂的东面,才会出现蔺相如“位在廉颇之右”的情况。古代以北面为正、为尊,皇帝坐了,自不必说。上古又以东面为尊,以右为上。所以,大臣们上朝,立班于朝堂的东面,是皇帝对大臣的尊重。同样的道理,文星荟萃于东南方位,也是皇帝尊重大臣的象征。至于当初的朝仪,大概是文武同列。除了廉、蔺的例证,文昌六星之中,分明还有将星的存在。似乎早在周、秦、汉初的时代,朝仪的规矩还没有形成左文右武的概念。

平遥的文庙、武庙,对称建在古城的东南、西南两个方位,这是明、清时期才形成的城市建设的一种文化规范。在现代旅游中,用“左文右武”来说明这种古代城市建设的文化规范,可以说是精练而准确的,但这毕竟是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化的理解。如果说平遥古城是根据“左文右武”规划建起来的,这话便成问题。因为这并不符合人文演进的历史情况。现在保存完好的平遥文庙大成殿,重建于金大定三年(1163年),说明文庙的始建年代应当更早。根据北宋宰相司马光为闻喜文庙撰写“宣圣庙”碑推测,平遥文庙当初或许也称为宣圣庙。而根据《平遥古城志》的推断,平遥武庙大概始建于元代,当初的庙名称“关侯庙”,并且除了供奉关羽之外,还供奉着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,所以民间又俗称为“五虎老爷庙”,在这“五虎”关侯庙立庙的当初,关羽实在还没有尊显到与孔子相对应的文化地位。然而对应是存在的。联系同样建在东南方位的琉璃九龙照壁,就可以知道:当初建立“五虎”关侯庙,并不是左文右武的讲究,而是另一组传统文化的意象对应——左青龙,右白虎。

《平遥古城志》在介绍文庙方位时,引《阳宅三要》中的话,说文庙是建在“六秀建元之地”。好像这文庙当初的选址,是遵循风水理论的规范,这就不免有点源流倒置了。中国的第一座孔庙,从春秋时期开始,就一直建在曲阜城的东南方

位,这对唐代以后天下普建文庙的选址,最具有示范意义。虽然不能说曲阜孔庙对古代天文学有什么影响,但东南星空文星荟萃的天象,显然与天下文庙在方位上作了相得益彰的呼应,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庙方位的人文内涵。天下普建文庙,起码比《阳宅三要》的成书要早一千多年。风水学说再神奇精妙,也不可能去规范指导一千年以前的文化形态。合理的认识,应该是古代的天象文化和文庙文化影响了风水学说,而不是风水学说规范了文庙文化。明白了这一点,那“六秀建元”是什么具体内容,也就没有必要探讨了。

中华民族远古的先民们,在长期观察大自然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实践中,对方位形成了独特的、具有基础意义的文化认知。如:阴阳八卦、五行、四象、二十八宿、二十四节气等等,许多成体系的传统文化,都是以方位为基础演绎的。平遥文庙的大成殿,重建于金大定三年,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其初建年代当然更早,或许文庙现在所处的东南方位,就正是唐代孔庙初建时的原址。

《周易》一书中说:“观其天文,以察时变;观其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这正是儒家通过人文教化、规范社会秩序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平遥古城从小到建筑的装饰细节,大到建筑的整体布局,无不充分体现着这种人文教化的思想。这就使得承载着教化职能的文庙及其方位内的其它景观建筑,更具有典范意义。古人认为,充满文德意象、朝气蓬勃的东南,正是建立文庙最得体的方位。有文庙立在东南方位,则圣贤得以尊崇,道德有所归依,文化教育得以兴盛,礼治政教得以昌明,于是乎就可以“垂拱平章”、“化成天下”了,为什么古人如此崇拜这东南方位呢?也许,远古的先民们歌颂东方的诗句,表达得最为纯正明白,《诗经》里说:“东方明矣,朝既昌矣!”

(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票号博物馆)